

导 言

第一节 史学近代化和新史学

所谓新史学是指在外来学术思想影响下出现的，反映近代社会特点的史学。它既与传统史学有密切联系又有显著不同。20 世纪中国历史学近代化过程中，求“新”是各个学派的共同追求。回顾一百年的历史学发展，从总体上说，先后出现过两种新史学：一是 20 世纪初出现的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一是五四以后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这两种新史学联系起来，大体反映出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历程，明显地体现出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特点。^{〔1〕}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代表了中国史学的新方向，在近代史学的发展中，逐渐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主流，故本书另辟一节进行论述。本节所说的新史学潮流，特指 20 世纪上半期，在西方学术思潮影响下，由梁启超始发其端，经过不断延

〔1〕 吴怀祺：《吕振羽与马克思主义新史学》，见《北京档案史料》，2001 年第 1 期，233 页，后收入《吕振羽研究文丛》（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年 5 月版）。

伸、分化而形成的史学思潮。

一、新史学的发展历程

1 第一阶段 :20 世纪初年到新文化运动，新史学的发轫时期

中国传统史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到了封建社会末期，它日益显现出保守性与封闭性。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动时代，传统史学出现了某种变革：“经世”史学兴起，史学与社会改革、挽救危亡、反对侵略联系在一起，其具体表现是外国史地研究受到重视、当代史著述增多等等。社会的剧烈变动，还引起了历史观的变化。19 世纪末，严复引进西方的进化论，大力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史学从经世史学向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的近代史学转变。19 世纪后期中国史学的发展趋势及其特点，大致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封建史学日趋衰落，另一方面是爱国学者利用外国历史资料作为揭露和反对外国侵略斗争的工具。资产阶级学者初步提出对封建史学的批判，开始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史学，为后来 20 世纪初期建立新史学的活动拉开了序幕。〔1〕

新史学的奠基人是梁启超。他以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吸收外国史学理论，尤其是日本学者浮田和民在《史学通论》一书中所阐述的史学理论，构建起新史学的理论体系。1901 年至 1902 年，梁启超先后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高举“史界

〔1〕 俞旦初：《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 页。

革命”大旗 开新史学之先河。

20 世纪初，梁启超表示了与传统史学彻底决裂的决心。

1902 年，在《新史学》一文中，他对封建史学进行了猛烈批判。他尖锐地指出 封建史学存在“四弊”、“二病”。“四弊”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病”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他疾呼：“史界革命不起 则吾国遂不可救。”如何革除旧史学的“弊”与“病”呢？梁启超说：“善为史者 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 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吾中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1〕在梁启超看来 新史学与旧史学不同 它不是以王朝更替和一姓兴衰为研究对象 而是以历史进化论学说为指导，“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求得其公理公例”。应该指出 梁启超对封建史学的批判有一定的片面性，没有肯定其中的积极因素。但在当时封建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史学界，其言论的确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对于破除对封建史学迷信 解放思想 产生了重大作用。附带指出，20 年代，梁启超的进化论史学思想在某些方面有所倒退。1922 年 他撰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以求得因果关系为导引 对《新史学》中关于历史的概念作了修正。他说：“史者何 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 校其总成绩 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2〕这里 他将

〔1〕 梁启超：《新史学》 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3~6、10、8 页。

〔2〕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1 页。

“进化现象”改为“赓续活动之体相”以人类社会的“赓续”修正了他以前所提出的人类社会是进化的观点，抛弃了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的这个灵魂。当然，这一时期梁启超对进化史观的历史进步性还是肯定的。他说“达尔文花费数十年时间著书数十万言”，结果不过诒吾辈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八个大字而已。然试思十九世纪学界中，若少却此八个大字，则其情状为何如者？”〔1〕

梁启超的《新史学》是新史学诞生的宣言书。20 世纪初期，新史学开始起步。这一时期的“新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提倡历史进化学说。章太炎也论述了新史学的宗旨和功能，为新史学的产生奠定了重要基础。他主张改革旧史学，强调著史的宗旨在于标明社会的发展进化。1902 年他致信梁启超提出通史之作有两方面的宗旨，一方面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的原理为主，一方面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刘师培也是新史学的积极倡导者。1905 年他编写了一部《中国历史教科书》以历史进化观点叙述了汉族与其他各民族的关系以及各民族在政治、伦理等方面的进化情况。屠寄于 1903 年至 1904 年间执教京师大学堂时所编的《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编著宗旨即是阐明“草昧以来人群进化之理”。屠寄尝试运用历史进化观点解释中国古代历史，这是对传统史学的大胆突破〔2〕

〔1〕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 81 页。

〔2〕 参见吴泽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下册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第 288 页。

2、第二阶段 五四前后 新史学潮流的初步形成时期

五四前后 指从 1915 年新文化运动开始到 20 年代末这一段时期。这一时期，新史学发展主要特点是：

(1)各种西方思想学说纷纷传入中国，极大影响了中国史学界。

西方思想学说的输入途径：一是五四运动前后，一批留学欧美的学生回国，直接带来了西方的史学思想。如：何炳松回国后 致力于宣传美国鲁滨逊的“新史学”胡适回国后 系统阐发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二是西方思想家来华，宣讲其学术思想。如 1920 年至 1921 年 罗素来华讲学 宣传他的新实在论和逻辑分析哲学，对实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实用主义是与实证主义密切相关的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流派之一。1919 年 5 月，实用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杜威来华，他花了两年的时间 在中国大力宣传其实用主义主张 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西方学术思想对中国史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朱谦之于 1926 年出版的《历史哲学》一书 其主要理论依据就是杜里舒的新生机主义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雷海宗接受了德国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学说，后来成为文化形态史观的代表人物。

(2)传统考据学和西方实证主义、实用主义思想相结合的史学方法开始居主流地位。

中国传统史学重考据 众多史家在史料搜集、辨伪、考释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尤其是乾嘉学者以求实的精神 在史料整理和历史考据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胡适将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和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结合起来，提出其实证主义史学思想。

1915年 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 师从杜威学习哲学 系统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方法。 1919年 2月 胡适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 将中西史学方法糅合 为实验主义史学总结出一套范式。蔡元培为《中国哲学史大纲》作序说 胡适继承了世传汉学的家学渊源，在美国留学时又对西洋哲学史很有心得 其著作吸收了中西学术方法之长 尤其是他所提出的‘证明的方法’^{〔1〕}，为后来的学者开无数法门”。实验主义方法包括历史的方法和实验室的方法 胡适将其归结为：“科学的方法 说来其实很简单 只不过‘尊重事实 尊重证据’。在应用上 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 小心的求证’”^{〔2〕}

王国维是这一时期用新方法研究史学的另一个代表人物。王国维早年醉心于西方哲学和美学，特别是叔本华和康德的哲学。后来在罗振玉的影响下转而研究古史，以实证史，以史考实，成为实证主义史学的先驱。他将乾嘉学者的考证方法和西洋近代方法特别是实证主义方法相结合，开辟了史学研究的一条新路。王国维有深厚的国学基础 又曾留学日本 受过西方自然科学和哲学的严格训练，因此真正做到了学贯中西。研究经史 必须以文字学、音韵学、古器物学、金石学等为基础 这是乾嘉学者治经史的主要途径。王国维研究古文字和古史，在学术源流上 与乾嘉学者有密切关系 后期的考史方法则直接受西方

〔1〕 蔡元培：《中国哲学史大纲·序》 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 东方出版社 1996年版 第1~2页。

〔2〕 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 见《胡适文存》 3集卷 2 黄山书社 1996年版 第93页。

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他重视对地下发现的实物资料的研究，将实物与文献结合运用于史学研究，并强调研究历史当以事实决事实 而不以后世之理论决事实。在治古史时 他不受古典文献的束缚 在考证殷先公先王时 将甲骨文和《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辞·天问》等古书中的‘百家不雅驯之言’互证 在古史考证方面作出了卓越成就。

受这一时期新的史学思潮影响，梁启超的治史旨趣也发生了转变。五四运动以前 梁启超用新理论批判旧史学 尚‘致用’ 而着重于对历史的宏观解释和评论。到 20 年代 他认识到 这个时代的学术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他开始着力于用实证方法研究史学。他说：“吾侪今日所渴求者 在得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我国人无论治何种学问 皆含有主观的作用——揆以他项目的，而绝不愿为纯客观的研究。”“吾以为今后作史者 宜于可能的范围内 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 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夫然后有信史 有信史然后有良史也。〔1〕

(3) “疑古辨伪”思潮兴起，史学工作的重点在打破旧古史系统。

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蓬勃的反封建精神，就连封建学术偶像孔子也被斥为孔家店而加以打倒，这对中国史学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疑古辨伪”思潮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兴起的。

“疑古辨伪”思想的代表人物是顾颉刚。1923 年 顾颉刚在

〔1〕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 37、39 页。

《读书杂志》上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该文在探讨上古史关于尧舜禹的地位问题以及有关传说的演变中，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顾颉刚通过考证史实说明，以往传说的古史不可信，有些是后人依据某些需要造出来的；这实际上是对《六经》的某些内容提出质疑。顾颉刚的古史观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后来一批以“疑古辨伪”为治学宗旨的学者形成了“古史辨”派。

“古史辨”派直接承袭今文学。顾颉刚说，自己推翻古史的动机是受了《孔子改制考》“明白指出上古茫昧无稽的启发”。但他又认为今文学家“拿辨伪做手段，把改制做目的，是为运用政策而非研究学问”，其治学方法有局限性。^{〔1〕}顾颉刚的“疑古辨伪”思想更大程度是受胡适、钱玄同等人疑古思想的影响。胡适从疑古和考信的态度出发，主张在古史研究中，一定要对材料问题持谨慎态度。其实验主义思想迎合了五四时期兴起的科学主义思潮，在史学界造成一种无征不信的风气，对于批判崇古、泥古的封建史学思想起了重要作用。钱玄同是疑古辨伪运动的另一个重要人物。钱玄同的学术成就主要在语言文学，但他在史学思想方面也有重要贡献。他既反对“泥古”，又反对“蔑古”。他辨真伪，审虚实，求真信，成为承袭清代道咸年间今文家余绪而又启发现代用科学方法扩大辨伪运动的第一人。^{〔2〕}顾颉刚

〔1〕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见《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3页。

〔2〕 陈漱渝：《钱玄同文集·序二》见《钱玄同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卷，第13页。

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说：“我非常地感谢适之、玄同两先生，他们给我各方面的启发和鼓励，使我敢于把违背旧说的种种意见发表出来，引起许多同志的讨论。这个讨论无论如何没有结果，总算已向学术界提了出来，成为学术界的公同的问题了。”〔1〕

“古史辨”派对旧古史系统的大胆破坏，不免有疑古过头的地方。王国维注意到这一点，并对疑古派的偏颇有所纠正。他说：“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2〕他强调要在实证的基础上疑古。

“古史辨”派的活动，彻底破坏了中国传统的古史系统，其疑辨精神，极大促进了中国史学界的思想解放，在史学近代化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国外有学者认为：“在中国，以西方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概念和方法为基础，扭转历史研究的方向，则以顾颉刚这位中国历史学家的名字为标志。”〔3〕

3. 第三阶段 三四十年代 新史学的进一步发展时期

三四十年代，新史学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一时期新史学发展的特点主要有：

（1）打破旧史学系统与重建新史学并重。

〔1〕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见《古史辨》第1册第3页。

〔2〕 王国维：《古史新证》见《王国维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4卷第2页。

〔3〕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52页。

1940年 张荫麟在其著作《中国史纲》的‘自序’中总结 30 年代史学说：“就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 过去的十年来可算是一新纪元中的一小段落 在这十年间 严格的考证的崇尚 科学的发掘的开始 湮没的旧文献的新发现 新研究范围的垦辟 比较材料的增加 和种种输入的史观的传播 使得司马迁和司马光的时代顿成过去 同时史界的新风气也结成了不少新的 虽然有一部分还是未成熟的果。”〔1〕

新史学产生后，学界提出了反对以帝王朝代为中心编写历史的口号，建立新通史体系的任务被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三四十年代 新史家撰写了一批通史著作。如邓之诚的《中华三千年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书中提出青年学子通观历代兴亡的重要性。缪凤林的《中国通史要略》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从历史史略、政治制度、学术文化等方面分别叙述中国历史。吕思勉的《吕著中国通史》、钱穆的《国史大纲》也是有影响的通史著作。

（2）史学理论方面有了新的突破。

三四十年代，新史学在史学理论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例如 张荫麟在 1940 年对书事义理问题以现代眼光进行了新阐释。张荫麟对新史学最具体而又最重大的贡献，无疑应推通史取材原理的发明。他在《中国史纲·自序》中提出通史家选事与综合的通常义例。〔2〕这是他晚年最精湛的理论著作 也是他精

〔1〕 张荫麟：《中国史纲·自序》见《中国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2 页。

〔2〕 张荫麟提出了通史取材的五种标准 详见《中国史纲》第 3~7 页。

研史学原理一生的心血结晶。自司马迁提倡“笔削”说以来，困扰中国新旧史家二千多年的书事义理问题，至此乃有一深切而允当的现代解答。^{〔1〕}

(3) 名家辈出，史学流派众多，但影响一代史学走向的流派不多。

在史学近代化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不同流派，他们都有重大建树，汇成史学近代化过程中的新潮流。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想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实证主义、实验主义史学思想仍有一定影响，主观主义、相对主义等史学流派也日渐活跃。由于近代社会的特殊条件，史家思想多变，导致难以形成有长期影响的学派。除马克思主义史学外，影响一代史学的流派并不多。^{〔2〕}

(4) 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其他新史家的相互影响更为明显。

从 20 年代起，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就与其他新史学流派交互影响，这种影响到三四十年代表现更为明显。唯物史观输入到中国后，迅速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其他新史家的治史方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30 年代，冯友兰吸收唯物史观的观点，使其中国哲学史研究水平明显高于胡适。五四时期，胡适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用近代眼光撰写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具有重大的开创性意义。可惜该书只写到先秦部分，实际上只是一部断代哲学史。胡适把中国

〔1〕 参见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册，香港中文大学，1986 年版，第 65～66 页。

〔2〕 具体论述可参看吴怀祺先生的有关论述，见刘新成主编：《历史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 年版，第 25～26 页。

哲学史分期为古代哲学、中世哲学和近世哲学三个发展时期。其中近世哲学是指宋元明清时期的哲学。由于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的分期与胡适明显不同。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史的发展是与中国通史的发展相适应的。中国历史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剧烈变动时期，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一次是清末中外交通时期，中国通史由此分期为三个阶段。中国哲学史也应分为与中国通史相适应的三个阶段。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主要论述了前两个阶段中国哲学的发展。第一个阶段是指春秋战国至汉初诸子百家争鸣的“子学时代”。第二个阶段是汉朝中叶至清末的“经学时代”。冯友兰所论述的子学时代的哲学实际上就是中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的哲学，经学时代的哲学实际上就是封建社会的哲学。二三十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唯物史观对学界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唯物史观的一般原则，影响了冯友兰。这种影响使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水平明显高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1〕一批新史家或多或少接受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如吕思勉在 1945 年发表的《历史研究法》中对于马克思主义以经济为社会基础的观点明确表示了赞赏的态度。他说：“马克思以经济为社会的基础之说，不可以不知道。……以物质为基础，以经济现象为社会最重要的条件，而把它种现象看作依附于其上的上层建筑，对于史事的了解，实在有很大的帮助的。”吕思勉

〔1〕 参见宋志明：《冯友兰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70~76 页。

在所有著作中，都把各个时期的社会经济作为基础来加以论述。^{〔1〕}

马克思主义史家也自觉吸收了其他新史家的学术成就。郭沫若指出 他的甲骨文、金文研究 以王国维、罗振玉的学术成就为起点。他说 王国维“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品 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 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 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罗振玉在古史研究方面也有重大成就。因此“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 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 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2〕}

(5) 这一时期特别是抗战时期 爱国主义史学思想呈现出新特点。

爱国主义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新史学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如新史学的奠基人梁启超，其史学作品的爱国主义宗旨十分明确。1902 年到 1905 年，他撰写了一系列宣传爱国主义思想的论著。例如：《匈牙利爱国者嘎苏士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朝鲜亡国史略》、《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等。爱国主义史学思想在三四十年代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从 30 年代初开始 日本大举进攻中国的危险日益迫近，一批爱国史学工作者由专事史料建设和微观研究转而从从事与国难边防有关的边疆史地研究。1934 年 顾颉刚创办《禹贡》半月刊，1935 年进

〔1〕 杨宽：《吕思勉》见《中国史学家评传》下册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第 1297 页。

〔2〕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科学出版社 1962 年版 第 3~4 页。

而成立“禹贡学会”。在“禹贡学会”的旗帜下，一批进步学者为挽救民族危亡而致力于边疆史地与民族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全面抗战爆发后，进步史家又以史笔为抗战服务。如吕思勉的《吕著中国通史》就是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成为“孤岛”的时候而写的。吕思勉在书中说：“颇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可见，作者编写此书有一个明显目标，就是想从中总结一些历史经验，用来指导我们今后的行动。^{〔1〕}在抗战时期，身处沦陷区的进步学者以隐讳的形式抨击日寇、汉奸，寄托自己的爱国情怀。如当时在沦陷区北平的史学家陈垣连续发表《明季滇黔佛教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清初僧诤记》等文章，以宗教史为题材，表彰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1943年，他致信西南的一位学者说：“至于史学，此间风气亦变。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2〕}《通鉴胡注表微》就是他提倡“有意义之史学”的代表作。1943年到1945年，他写成《通鉴胡注表微》20篇，通过探索南宋遗民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注的思想感情而寄托自己的民族情感。陈寅恪则在抗战的后方大西南，坚持民族气节，不肯曲学阿世，充分表现了爱国史学家的高尚品行。

总的来说，抗战时期，爱国主义史学发展的新特点就是除

〔1〕 杨宽：《吕思勉》见《中国史学家评传》下册，第1281页。

〔2〕 陈垣：《致方豪》见《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24页。

极少数汉奸学者外 各派史家有一个共同的活动趋向 便是适应抗战的需要,从历史方面作宣传教育活动。这一运动所触及的方面是广阔的 以专门论著、简明历史读本、报章杂志上的论文、通俗化的各种小册子等不同形式,从不同角度宣传抗战。有的从历史发展规律中指出抗战发展必经的途径和必能达到的成就;有的从中国宪政史的发展,证明今后民主政治应走的道路;有的从民族抗战的史迹中证明我中华民族潜在的力量和投降分子的危险性;有的叙述外国抗战的史迹以资借鉴,等等。〔1〕

二、新史学的新方法、新史观和新史料概略

20世纪上半期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史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

1、新方法

西洋学术思想和方法的输入,加速了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进程。顾颉刚于 1947 年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 对此作了具体分析。他说:“过去的乾嘉汉学 诚然已具有科学精神 但是终不免为经学观念所范围 同时其方法还嫌传统 不能算是严格的科学方法。要到五四运动以后,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才真正输入 于是中国才有科学的史学可言。在这方面表现得明显的 是考古学上的贡献 甲骨文和金文经过科学的洗礼 再加上考古学上的其他发现,便使古代文化的真相暴露了出来。此外如新的考据论文 多能揭发各时代历史的真相 而史料的整理 也比从

〔1〕 叶蠖生:《抗战以来的历史学》 载 1941 年 8 月 20 日《中国文化》第 3 卷第 2 期。

前要有系统得多 这都是科学方法之赐。”〔1〕

一批直接受西学影响的人成为现代史学思想启蒙的先驱，他们向国人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西洋的学术思想和方法。以实证主义思想的传播为例。实证主义是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之一。1896年 严复最早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 赫胥黎在哲学上是一个实证主义者 列宁称其为休谟主义者 后来严复又翻译了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和穆勒的《论自由》等实证主义思想的代表性作品。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对早期实证主义者孔德的学说作了某些介绍。实证主义的第二代马赫主义则是由丁文江等人在中国传播的。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法国柏格森的“生命哲学” 英国罗素的“新实在论”等 也被介绍到中国。

中国学者借鉴了西洋的史学方法。如：傅斯年参照西洋的历史语言学方法 提出语言学的方法与历史的方法相结合 从发展、变化的角度研究语言与思想的关系。陈寅恪利用通晓多种语言的优势 将其他各种语文资料和汉文资料相比照 得出一些独到的结论，在某些方面实践了傅斯年的史料学理论。

用新方法研究史学，立足点还在对中国传统史学方法进行更新和改造。对待传统史学遗产的态度，学者们有所不同。新史学初期，梁启超对传统史学主要采取基本否定的态度。后来的国粹派则对其持基本肯定的态度，并且用中国古代学说附会近代西方理论。胡适以实验主义理论为标准决定传统史学的取舍。20年代后 总的学术大势是 在分析批判的基础上 对中国

〔1〕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 南京胜利出版公司 1947年版 第2~3页。

传统史学的基本精神和治学方法作某种肯定。如：梁启超在后期，由对封建史学的彻底批判转为对其进行理性分析。他在分析乾嘉学者的长短之处时说：“以乾嘉学派为中坚之清代学者，一反明人空疏之习，专从书本上钻研考索，想达到他们所谓‘实事求是’的目的。依我们今日看来，他们的工作，最少有一半算是白费，因为他们若把精力用到别个方向去，成就断不止此。但这是为时代性所限，我们也不能太过责备。至于他们的研究精神和方法，确有一部分可以做我们模范的，我们万不可以看轻他。他们所做过的工作，也确有一部分成效。”〔1〕

中国史家参照西洋治史方法，同时吸收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长处，作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以陈垣为例。陈垣的史学研究借鉴了乾嘉学者的精密考证方法。对于乾嘉学者，他服膺钱大昕，在考证方面受其启发颇多。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征引 200 余种图籍，具体阐述了元朝百年间西域诸族人吸收并传播汉文化的情况。1935 年，陈寅恪在该书重刻本“序言”中说：“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徵以来，未之有也。”〔2〕显然，陈垣的考史是钱大昕等乾嘉学者考证工作的延续。但同时陈垣又不为乾嘉考证方法所局限，他运用近代科学方法整理文献，并归纳出文献工作的法则。如他所总结的“校勘四法”，提出了校勘学的系统理论，将乾嘉以来校勘学成就向前推进了一步。

总的来看，20 世纪上半期新史学的重点在史料的扩充和史

〔1〕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20 页。

〔2〕 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见《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06 页。